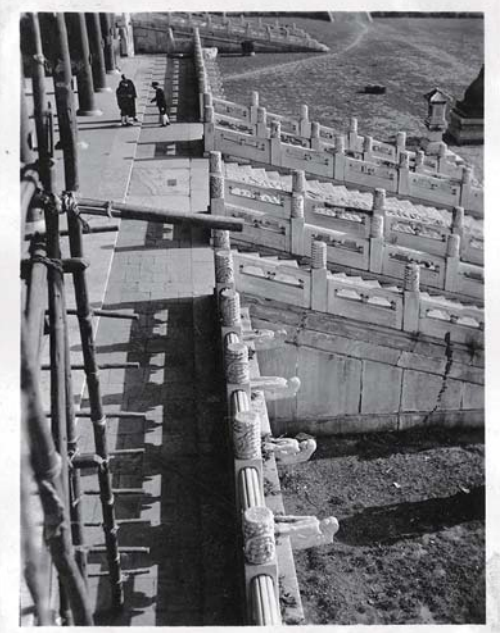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北平故宫弘义阁下檐琉璃套兽。
▼北平故宫太和门上搭建的测绘用脚手架。



特约撰稿刘梦雨

1932年10月,故宫博物院的总务处长俞星枢正在为文渊阁犯愁。这座乾隆年间修建的皇家图书馆已经在紫禁城的东南角矗立了将近二百年,木质的楼面与梁柱被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压得不堪重负,上层楼板日渐凹陷,安放其上的书架也随之变形,显出倾圮之势。虽然故宫方面早些年已经为此将《四库全书》全部取下,另外装箱,存入别库,但文渊阁楼面岌岌可危的状况仍然如故。两年前,文渊阁的管辖权刚刚从古物陈列所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建筑维修的职责,自然也归于故宫博物院的总务处。年久失修的木建筑,结构形变日增,遇上狂风骤雨,往往便有倾圮之虞。因此,总务处长不得不操心起文渊阁的修缮问题。修理古建筑,毕竟不比寻常房屋修缮。文渊阁因其特殊功能导致的楼面凹陷,也远远超出普通匠人的经验范畴。面对这样一座在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建筑,如何才能整复如故,使之免遭倾圮,而又不致成为破坏古物的罪人?站在文渊阁下,俞星枢想到了一个人——朱启铃。

渊源:抢救文渊阁

如今朱启铃的名字为人所知,多半是因为他创办了营造学社。这个中国第一家研究古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在学术史上几乎是个传奇般的存在: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以短短17年的历史,十余人的规模,完成了将近两千座古建筑的调查,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论的研究范式,独力开创了一个学科。但营造学社只是朱启铃一生中开创的诸多事业之一。作为北洋政府大员,朱启铃曾在熊希龄内阁担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留下诸多掌故,其中之一,就是他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人人知道,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由明清故宫改造而来。但很少有人记得,这场从宫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馆的大变革,其发起人和主持者,正是朱启铃。

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是以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为起点的。1912年溥仪逊位之后,仍然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而前半部——也就是“外朝”部分,则收归国民政府内务部管辖,在朱启铃的主持下,用于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14年,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经过数月筹备整修,当年秋天对外开放,举行文物展览,“往观者老幼男女络绎不绝”,为一时盛事。1924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在后官部分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一度与古物陈列所成为并存的两个机构,直到1947年合并。因此,古物陈列所今天被公认为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身兼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朱启铃,素来对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问题关心有加。这既是他的工作职责,也是他的个人学术兴趣与修养。在并不算长的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朱启铃的不少举措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以及将社稷坛改造为北平

测绘紫禁城

战争阴影下,营造学社为北平古城抢救下一份空前绝后的珍贵记录

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作为一名主管市政建设的官员,朱启铃的愿望,是在保留古都风貌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北京的现代城市化改造。他以自己的见识眼光,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现代化的良好开端。

洪宪称帝失败后,朱启铃逐步退出政界,一方面兴办实业,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1930年,朱启铃赁下北平宝珠胡同的一处房屋,在此创办了**营造学社**,延揽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建筑师加入,以“沟通儒匠,潜发智巧”为宏旨,致力于营造学研究。两年后,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进入学社任职,分别主持法式部和文献部。中国古建筑研究由此开辟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回到1932年,俞星枢为文渊阁修缮事宜请来的专家,正是**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铃**,和刚刚加入学社的**梁思成和刘敦桢**。

在实地考察之后,梁刘二人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荫合作,对文渊阁的主要构件荷载进行了一番缜密的结构力学计算,得出结论:文渊阁所用大梁,以断面面积及材料密度计算,本应足够承载楼面荷载,问题出在这些大梁用的不是整块木料,而是小料拼合,导致其承载力减半,因此梁身逐渐向下弯曲,楼面也随之凹陷。病因既明,一份科学的修理计划也得以详细拟定。

彼时,中国的建筑保护事业刚刚拉开帷幕,作为这场征程的起点,营造学社将古老的紫禁城带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使命:补图学术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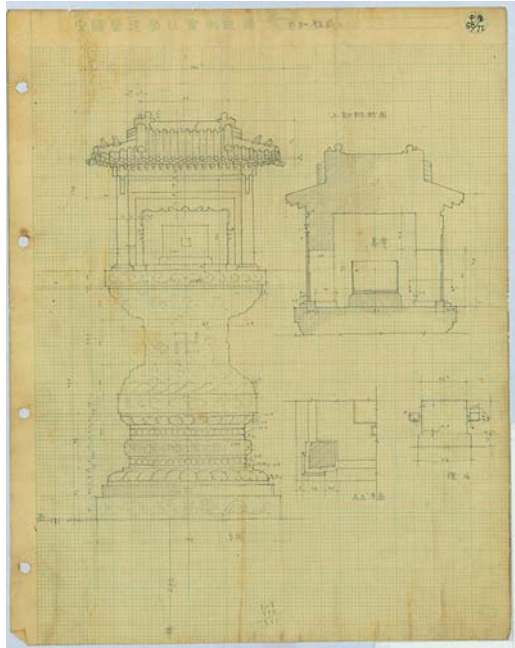
勘察文渊阁,并不是学社第一次参与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早在1931年,朱启铃发起故宫角楼修缮工程,会同多所机构成立了一个修理城楼委员会,营造学社即在其中,负责方案审查和工程验收。这是营造学社第一次参与古建筑修缮实务。

两年后,学社再次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勘察测绘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并为之作修缮设计。几年下来,结合其他工程实践经验,营造学社已经在纯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之外发展出一个新的身份,成为当时北平最专业的古建筑修缮咨询团队。因此,故宫方面对于营造学社的倚重便不难理解。

而另一方面,营造学社也同样需要故宫。营造学社早有解读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学术愿望。有清一代注重则例编纂,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建筑术书《工程做法》。按照梁思成的说法,这部记载了清代官式建筑做法和工料用例的专著,堪称一部清代建筑的“文法课本”。



▲北平故宫太和殿下檐东南角套兽俯视图。
▶北平故宫太和殿须弥座石刻测稿。



▲北平故宫太和殿前嘉量测稿。

▼北平故宫太和殿天花藻井斗拱测量数据表。

遗憾的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文献学家,面对这部书,恐怕也会遇到阅读障碍。清式建筑等级繁多,种种复杂做法,以艰涩术语语出之,若无图示,实在难以读解。

因此,营造学社在创建之初的研究规划中,就有一项重要的课题:为清《工程做法》补图。所谓“补图”,就是用现代科学的工程制图方法,把费解的文本翻译成一目了然的图样。能够绘出图样,也就意味着对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完全理解。

如何理解?摆在眼前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在世的老师傅取经,二是调查研究清代官式建筑实例。

学社的工作同时从两方面着手。朱启铃延请老师傅绘制了一批图纸,但这些老师傅没有受过现代工程训练,制图效果难尽人意。不过,匠师们传授的经验和术语,还是给了学社的研究人员许多助益。

另一方面,要进行实地调查,现存的清代官式建筑实例中,最规范也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就是故宫了。对故宫建筑群的调查研究,显然是解读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绝佳路径。

当时的**华北已经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朱启铃知道,调查工作必须抢在战争来临之前。这些脆弱而易燃的木构建筑,根本经不起哪怕一颗炮弹的袭击。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每座建筑的生命都已进入数字未知的倒计时。

于是,对营造学社而言,无论出于古迹保护的实务,还是基于古建筑研究的学术需要,测绘紫禁城,都成为一项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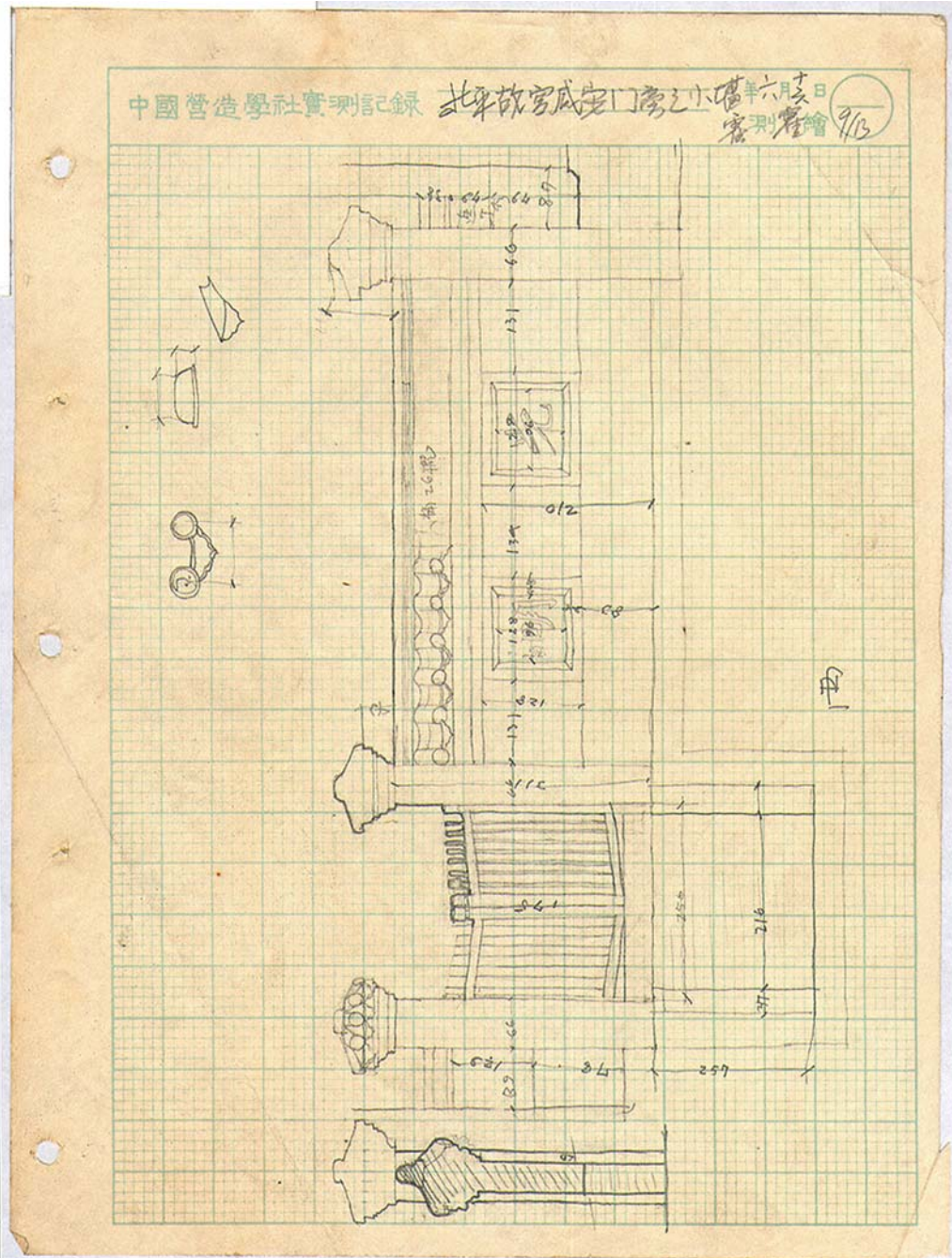
凭借之前与故宫数次合作的良好基础,这项承载着营造学社学术使命的宏大测绘计划,很快就启动了。

队伍:恰风华正茂

1933年,朱启铃以营造学社社长名义致函古物陈列所,请求进入故宫测绘。古物陈列所很快复函同意,给五位工作人员——梁思成、邵力工、王蕴华、莫宗江及“仆役一名”——颁发了临时门证。他们五人参与测绘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此后,又有其他成员陆续加入这项“日持久的工程”。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时年32岁的梁思成以法式部主任身份担纲,其余几位测绘主力,也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

29岁的邵力工是这个项目中仅次于梁思成的核心人物。**头两年的测绘工作由梁思成主要负责,后期则逐渐移交邵力工**。与众多声名显赫的同僚



▲北平故宫西华门内咸安门旁小墙测稿。

相比,邵力工这个名字,在营造学社的成员中并不醒目,但在学社的早期活动中,作为学社的法式助理和绘图员,他承担了大量的勘察测绘工作。可惜许多成果未能最终完成发表,使他没有在学术史上获得应有的声名。

17岁的莫宗江是梁思成的助手,15岁那年进入学社担任绘图员,后来升为研究生。虽然没有上过建筑系,但对建筑与绘画有极高的天赋和悟性,使他很快就成为学社最出色的绘图员。如今声名遐迩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那批精美的插图,便出自莫宗江之手。

麦伊曾和纪玉堂也是这项工作中的主力。麦伊曾是康有为的外孙,母亲康同薇是康有为的长女。1934—1937年间,麦伊曾一直在营造学社做研究生,参加过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许多田野调查和测绘工作。在北平,除了故宫之外,他还测过北海静心斋。

纪玉堂是学社另一位测绘人员,参与过学社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发现佛光寺。抗战爆发后,他没有随学社主力南迁,而是留在北平。日后学社资料遭水灾损毁,他还曾参与过测稿的整理和补绘,也是一位贡献良多却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参与测绘的人员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王蕴华。她并不是学社的职员,而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28年亲手创办的,头几届学生都与他们有深厚的师生之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一批学生流亡至北平,生计无着,梁思成就设法安排他们在营造学社工作。其中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故宫测绘。

资助:史语所倾囊

不久之后,营造学社这项故宫测绘计划得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助。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中央研究院拨款五千元,委托营造学社测绘故宫的全部建筑,并出版成书。

这项委托,究竟是史语所的意向与学社不谋而合,还是营造学社为筹经费主动向史语所提出申请,今天已经找不到什么线索来证实。但此时得到这笔资助,对学社的测绘无疑是颇有裨益的。而对史语所而言,委托学社测绘故宫建筑,也不失为一项颇具意义的学术资料收集工作。

以今天的学科观点视之,研究建筑的营造学社属于工科,似乎与从事“文科”研究的史语所全不相干。但这套学科划分方法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体系建立起来的,民国年间,刚刚开始探索新史学道路的历史学者,

秉持“一切史学都是史料学”的思想,所关心的史料,绝不仅仅限于故纸堆而已。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充分反映出史语所一以贯之的学术指导思想:以科学考古作为新史学实践的工具。短短数十年,从殷墟到安阳,史语所在考古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将清宫建筑作为地上之考古材料,纳入清史研究范围,对史语所来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全仗朱启铃年复一年地多方筹措,直到1937年初彻底断绝,学社活动只得停止。因此在当时,一笔固定的资助款项就显得相当珍贵。故宫测绘工作得以在此后五年间坚持进行,史语所的资助或许功不可没。

测量:全部徒手画

1933年春天,营造学社的测绘团队正式进入故宫,开始工作。

按照学社当时工作的一般习惯,在一个调查测绘项目完成后,主要负责人会撰写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测绘图稿、照片、文献调查、分析研究,以及对调查工作始末的叙述。遗憾的是,故宫测绘的项目未能最终完成,这份报告也永久付诸阙如,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其他参与者,都没有为这项工作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如今只能依靠他们留下的零散资料,拼凑当时测绘工作的始末。

当时的测绘条件与今天相比不啻霄壤。没有能够远距离测量的激光测距仪和全站仪,也没有能够自动记录数据的设备,要获得任何一个尺寸,都只能爬高上梯,手工测量,再用铅笔记录在纸上。从有限的几张工作照上,还能看到当时按照传统方法用杉木搭起的脚手架。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营造学社的工作方法之科学高效,又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这从留存至今的测稿可见一斑。所谓测稿,指的是在现场工作中徒手勾勒并标注尺寸的草图。测稿是测绘工作中的一手资料,相当于人类学家的笔记本,或是博物学家的标本册。

营造学社有自己专门定制的测稿用纸,统一大小,左侧有活页标准间距打孔,便于装订保存。稿纸分为几种格式,一种是标准的测稿稿纸,有细密的方格,便于徒手绘制测稿时估算大致的尺寸比例。纸页上方是标准题头,印有“中国营造学社实测记录”,右上角则留有填写图纸编号的空白栏。1935年之后使用的新版稿纸,还加上了测绘日期和测绘人姓名。

另一种是测量数据表。清代建筑构件繁多,每个大大小小的构件,在现场都必须逐一测量记录尺寸,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学社创造性地设计了专用数据表,事先将所有构件的名称分门别类罗列出来,现场工作时,只需要直接填入尺寸数据即可,既节约时间,又能避免遗漏。

工作时,测绘人员分为几个小组,分头测绘不同的建筑。对于复杂的建筑,两人一组,一人爬上脚手架去测量,一人绘制测稿,记录尺寸。而对于简单的建筑,就只由一个人负责,一边测量一边记录。

(下转11版)